

馬蹄疾 著

魯迅與作家

魯
迅

與
作

家

魯迅與浙江作家



馬蹄疾著

華風書局出版

書名：魯迅與浙江作家

作者：馬蹄疾

出版及發行：**華風書局**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4-6號 電話：5-749495

承印：太古印刷公司承印

版次：1984年8月初版

定價：港幣40元

書號：ISBN962-227-047-6



鲁迅

弁言

從區域的角度研究魯迅，早在五十年代就有陳夢韶先生的《魯迅在廈門》（1954年10月作家出版社版）、曾敏之先生的《魯迅在廣州的日子裏》（1956年9月廣東人民出版社版）和單演義先生的《魯迅講學在西安》（1957年12月長江文藝出版社版）等專著出版，最近幾年來，這方面的研究無論是廣度或者深度，都有新的進展，僅公開出版

就有漱渝兄的《魯迅在北京》（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魯迅與湖南作家》（收1982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版《魯迅史實新探》）、劉增傑先生的《魯迅與河南》（1981年8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版）、朱忞先生等的《魯迅在紹興》（1981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等。這些著作的出版，無論對魯迅生平的探索，還是對地方藝文志的研究，無疑是很有意義的，本書也試圖從區域的角度，來反映魯迅生平的一個側面——魯迅與浙江作家的交往及其影響。

從魯迅的歷史地位和影響來講，魯迅是世界的，魯迅的“愛在大眾”。和他所交往的人物的親密或疏離、友好或對立，應該以階級和道德來區分，而不能以區域為界限，但我們如果從區域研究的角度來看，為什麼三十年代的浙江，在文壇上人才輩出，羣星輝映，在現代文學史上構成了一個絢爛奪目的星座？這除了有其本身的歷史根源和現實條件外，這個現象的出現，也與魯迅對浙江作家的巨大

影響有着密切的關係、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如果沒有魯迅對浙江作家的巨大影響，和他對浙江文學青年的竭力的扶植、提攜和培養，是決不能出現這樣的壯觀的。

當然，從魯迅主觀方面來說，他在扶植、提攜和培養一個作家時，決不是從區域考慮出發的，不僅從來不考慮省的界域，連國的界域也是從來不加考慮的，只要人們求教於他，他都是熱情地、盡量地滿足對方的請求的，如他對東北作家蕭軍、蕭紅的扶植，對湖南作家葉紫、彭柏山的提攜，對安徽作家李霽野、韋素園的培養，對日本漢學家增田涉的幫助，對美國作家斯諾的支持……便是最明顯的，最爲大家所熟悉的例子，魯迅對浙江作家的影響，對浙江文學青年的扶植、提攜和培養，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一個部份。但從區域研究的角度看，因爲魯迅出生於浙江，又有五分之二的生命在浙江度過的，晚年的十年，又定居在和浙江緊鄰的上海，浙江籍的作家和文學青年，接觸魯迅的機會，得到魯迅的指導和幫助的機會，就要比其他區域的人要多，這也是一個事實，我們僅從《魯迅日記》看，和魯迅交往的國內人物大約有一千七百多人，而其中浙江籍的就有四百五十人，佔了總數的四分之一還多，這些人物中有魯迅的親屬、師長、同志、同事、朋友、學生，有未識一面的來訪者和求助者，他們中有工人、農民、商人、學生、軍人、官吏、律師、醫生、工程師、地質學家、教師、歷史學家、作家、導演、畫家……其中和魯迅有交往的作家，就有六十來人。這個數字是十分驚人的，本書從這六十來人中選擇有代表性的四十人，他們中有和魯迅攜

手進退的同窗，有並肩戰鬥的戰友，也有和魯迅有過筆墨之爭的論敵；有終生追隨的學生，有一手扶植起來的文學青年和來自部隊、農村、工廠的業餘作者，當然也有專事騙取魯迅文稿進行招搖撞騙的文販小丑。本書企圖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來反映魯迅和浙江作家的交往關係，而把重點放在魯迅如何扶植、提攜和培養文學青年上，突出描寫浙江文學青年如何緊密地團結在魯迅的周圍。虛心地聽取魯迅的教誨，在魯迅指引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上不斷前進和發展。但由於筆者的理論水平和搜集資料所限，力不從心，未能充分地正確地達到預想的目的，而且尚有三分之一的和魯迅有交往的浙江作家，有的因與魯迅交往過於一般，有的則因佔有資料尚不充分，一時都難以成文，只待今後繼續努力了。就是已經成文的四十篇，疏漏和謬誤一定不少，現謹以此未備之作，聊表筆者對故鄉的眷念之情。

本書目次排列，基本上以這些浙江作家在《魯迅日記》中出現時間前後為序，但個別酌情作了調整，如夏丏尊和陳望道《魯迅日記》中出現他們的名字較遲，和魯迅實際交往的時間却較早，就適當的提前了一些。

本書編寫過程中除參考了浙江作家自己所寫的回憶錄外，還吸取了近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一些浙江作家和魯迅的關係已有專論，例如姜德明先生的《魯迅與錢玄同》，資料完備，觀點正確，行文佈局又很得當，已是一篇完備的論文，無須由我再寫一遍，但從本書體例考慮，錢玄同是和魯迅交往的浙江作家中具有代表意義的一人，

所以也仍勉力寫出，但學步畫瓢的痕迹是十分明顯的。這樣的例子也並非只此一篇。爲了說明本書曾經採納了哪些研究成果，感謝這些作者的辛勤勞動，也便於讀者查找原書，特於書末附了本書參考目錄。

唐弢先生爲本書題箋；錢君匋先生爲本書設計封面；北京魯迅博物館陳漱渝、李允經，紹興魯迅紀念館裘士雄，《西湖》文藝月刊社董校昌，《浙江日報》社童熾昌，紹興市羣衆藝術館周弋棠，黃岩縣委葛增生，鄞縣縣委王文達，浙江人民出版社鐵流諸君，都對本書提出過許多寶貴意見，提供了不少珍貴資料；本書所附照片，都是魯迅和這些作家交往時代所攝，除少量採自報刊外，大都由這些作家本人和家屬提供，均請鞍山市羣衆藝術館金榮順先生攝製，均在此致以深切的謝意。

馬蹄疾 1983年元旦之午夜，
時大寒襲窗，窗花閃爍，
余在鋼都東山後峪寓所。

目 錄

弁 言.....	1
魯迅與許壽裳（1883~1948）.....	1
魯迅與沈尹默（1883~1971）.....	13
魯迅與錢玄同（1887~1939）.....	17
魯迅與周作人（1885~1967）.....	27
魯迅與夏丏尊（1886~1946）.....	39
魯迅與孫伏園（1894~1966）.....	45
魯迅與范文瀾（1893~1969）.....	53
魯迅與周建人（1888~ ）.....	57
魯迅與孫福熙（1898~1962）.....	65
魯迅與陳望道（1890~1977）.....	69
魯迅與茅 盾（1896~1981）.....	75
魯迅與胡愈之（1896~ ）.....	89
魯迅與許欽文（1891~ ）.....	95
魯迅與郁達夫（1896~1945）.....	103
魯迅與章廷謙（1901~1981）.....	115
魯迅與魯 彥（1902~1944）.....	121
魯迅與陳學昭（1906~ ）.....	125
魯迅與馮雪峯（1903~1976）.....	129
魯迅與崔眞吾（1902~1937）.....	139
魯迅與王方仁（1905~1946）.....	145
魯迅與應修人（1900~1933）.....	151

魯迅與夏衍 (1900~)	155
魯迅與王任叔 (1901~1972)	161
魯迅與柔石 (1902~1931)	167
魯迅與孫用 (1902~1983)	179
魯迅與葉永綦 (1905~1965)	185
魯迅與白莽 (1909~1931)	189
魯迅與魏金枝 (1900~1972)	197
魯迅與傅東華 (1893~1971)	201
魯迅與黃源 (1905~)	207
魯迅與林克多 (1902~1949)	215
魯迅與楊之華 (1900~1973)	221
魯迅與姚克 (1905~)	229
魯迅與孔另境 (1904~1972)	237
魯迅與樓適夷 (1905~)	241
魯迅與曹聚仁 (1900~1972)	247
魯迅與胡今虛 (1915~)	255
魯迅與徐懋庸 (1910~1977)	259
魯迅與徐訐 (1908~1980)	269
魯迅與唐弢 (1913~)	273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279



許壽裳

魯迅與許壽裳

許壽裳是以專寫魯迅回憶錄而聞名的浙籍傳記作家。他和魯迅交往最長久，關係最密切，友誼最深厚。自1902年在日本弘文學院同學開始，以後幾度同事，同舟共濟，彼此心膽相照，親如手足。相敬相愛三十五年如一日，結為終生摯友。

許壽裳（1883—1948）字季黻，或作季萑、季市，號上遂。浙江紹興人。1902

年9月以官費赴日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文。魯迅比許壽裳早五個月到弘文學院，他們雖不在一個班，魯迅爲江南班，許壽裳爲浙江班，但終於因爲志同道合，意氣相投，共同爲民族的衰落而哀淒，爲異族的壓迫而怒號，結合在一起。就在許壽裳到弘文學院不久，兩人就成爲莫逆之交，許壽裳在《我所認識的魯迅》裏，回憶他們結識的經過說：

“有一天，談到歷史上中國人的生命太不值錢，尤其是做異族奴隸的時候，我們相對淒然。從此以後，我們就更加接近，見面時每談中國民族性的缺點。”

這是他們交往的開始。從此，他們兩人朝夕相處，形影不離，在課餘除經常談論國家和民族前途外，還經常一起到神田一帶書店選購圖書，每從書店歸來，兩人錢袋空空，相對苦笑，引以爲樂。在校期間還一起參加了一系列進步活動。如：1903年1月魯迅、許壽裳和陶成章等二十九名紹興籍留日學生在東京發起召開紹興同鄉懇親會，並聯名發出《致紹興同鄉公函》，勸導紹興鄉人出國留學，學習外國先進科學，以挽救危亡的祖國。三月，由於弘文學院院方對學生屢次提出要求改革學科課程置之不理，又無故增收學生費用，魯迅與許壽裳等五十二名學生發起了有名的“擠嘉納於清風，責三矢於牛人”的罷課抗議鬥爭。最後取得了罷課勝利。

1903年，魯迅爲了向好友表述自己以身許國，以身獻國的決心，在剪去髮辮的第一張照片上，題了七絕一首，贈給許壽裳。許壽裳曾把這首詩引錄在《我所認識的魯迅》一文中，並作了解釋說：

“魯迅對於民族解放事業，堅貞無比，在1903年留學東京時，贈我小象，後補以詩，曰：‘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閨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三十餘年來，刻苦奮鬥以至於死，完全是爲中華民族的生

存而犧牲，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這首詩既是魯迅以身許國的誓言，也是對好友許壽裳的勉勵。

1903年留日學生爲宣傳革命思想而創辦的《浙江潮》創刊了，第五期起，開始由許壽裳接任主編，許壽裳接編《浙江潮》後，首先請魯迅寫稿，魯迅對許壽裳的約稿，痛快應允，很快撰寫了一篇歷史小說《斯巴達之魂》，魯迅的第一篇翻譯的短篇小說《哀禾》，也是在《浙江潮》上首次發表的，以後撰寫的科普論文《說鉅》，科學論文《中國地質略論》等，也都是在許壽裳主編的《浙江潮》發表的。

1904年4月，魯迅在弘文學院結業，8月去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醫，在臨行前他向好友許壽裳告別時，將心愛的屈原《離騷》，贈給許壽裳作紀念。不久，許壽裳考入東京高師。這時，他們經常保持書信來往，互相報告學習和生活的情況，可惜的是這些書信現在都已散失，其中唯一的一封的一些內容，被許壽裳引錄在自己的回憶錄《我所認識的魯迅》一書中，這是魯迅到仙臺以後，告訴許壽裳因自己衣服單薄，每日借入浴取暖的事：

“魯迅1904年，往仙臺進了醫學專門學校，有一次來信給我，大意說氣候較寒每日藉入浴取暖，仙臺的浴池，男女之分，只隔着一道矮矮的板壁，同學們每每邊唱邊說，有的人乃踏上小杌子，窺望鄰室。信中有兩句，至今我還記得的：‘同學陽狂，或登高而窺裸女。’自註云：‘昨夜讀《天演論》，故有此神來之筆。’”

從中可以看出當時魯迅生活清寒和刻苦夜讀的情況。魯迅除經常給許壽裳寫信外，還在入學的第二年的春假時，特地從仙臺乘火車到東京，和許壽裳等同學，一起結伴登山，遊覽蘆之湖，眺望富士山，大家圍坐談天直到深夜。

1906年魯迅退學仙臺，棄醫從文，就又到東京，入學籍於



後排爲魯迅與許壽裳。

東京獨逸語學會所設的德語學校，和許壽裳又相處一起了，他們共同爲中華民族的前途擔憂，共同尋找振興中華的道路，一起赴會館聽講演，一起看新戲，一起參加徐錫麟、秋瑾追悼會。魯迅爲了喚起民族的覺醒，改變國民的精神，於1907年夏，和許壽裳、袁文薺、周作人一起，在東京籌辦《新生》文學雜誌，魯迅親自設計了雜誌的封面。但後來由於袁文薺的去英國留學，再加上經濟拮据，終於沒有辦成。以後魯迅和許壽裳幾乎經常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他們曾一起在孔特夫人那裏學俄文。次年，許壽裳已從東京高師畢業，他租下了一幢住宅，邀魯迅一起同居，因同住的尚有錢家治、周作人、朱謀宣，故起名“伍舍”。後來魯迅和許壽裳又一起到民報社聽章太炎講說文解字，和許壽裳又朝夕相處了三年。

1909年初許壽裳回國，出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魯迅當時由於家庭經濟負擔重，需要馬上參加工作，因此在許壽

袁回國前，就請托許壽裳推薦去兩級師範任教，當時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是沈鈞儒，許壽裳介紹魯迅，一薦成功。魯迅即於秋天回國，與許壽裳一起在該校任職任教。魯迅到校不久，沈鈞儒很快離開學校，上面派來一位滿腦瓜封建禮教的夏“木瓜”夏震武，許壽裳對夏震武的頑固保守，尊孔守舊的行爲作了堅決的鬥爭，許壽裳的正義鬥爭得到魯迅和絕大多數師生的支持，終於轟走了夏震武，這就是有名的“木瓜之役”。

不久魯迅和許壽裳先後離開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魯迅於1910年7月回紹興任紹興府中學堂教職，許壽裳在1912年初，接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之召，從北京去南京協助蔡元培籌備教育部工作，許壽裳到南京後不久，就向蔡元培推薦魯迅來南京協助工作，蔡元培久慕魯迅才學，立即要許馳函紹興，敦請魯迅速去南京報到。魯迅連接許壽裳的兩封來信，就於2月中旬去南京就職。故友重逢，分外親切。從此，又開始了他們的朝夕相見的同事同居時代。不久，南京教育部遷往北京，魯迅和許壽裳一起隨教育部遷居北京，又同居北京的紹興縣館。這時，正是袁世凱統治下的教育部，政局不穩，教育部官員都終日苦坐，無所是事，魯迅和許壽裳就經常出沒於琉璃廠舊書店和文物店，覓購漢魏石刻碑拓，這樣共同生活了五六年，至1917年底許壽裳由教育部參事改任江西教育廳廳長止。許壽裳在南昌三年多，到1920年才回北京教育部。在這離別的三年中，魯迅和許壽裳彼此書信往返從未中斷，當時的北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出現了很多倡導新文化運動的進步社團和進步刊物，魯迅經常把一些進步刊物如《新潮》《新青年》等寄給在江西的許壽裳；許壽裳在外地，也經常爲魯迅搜集石刻碑拓。許壽裳回北京教育部不久，於1922年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次年10月許壽裳延聘魯迅兼任該校講

師，講授中國小說史課。1925年8月，由於魯迅支持女師大進步學生驅逐校長楊蔭榆運動，北洋軍伐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章士釗非法宣佈魯迅教育部僉事的免職令，引起了社會人士和教育部同事的強烈不滿，首先支持魯迅，抗議章士釗的是魯迅的好友當時任教育部部員的許壽裳和教育部視學齊壽山，他們率先聯名發表宣言，提出罷職，以示抗議，並強烈表示“章士釗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積極支持魯迅的正義鬥爭。在魯迅好友的支持下，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段祺瑞政府不得不撤銷章士釗的免職令，恢復了魯迅在教育部的僉事職務。在女師大事件中，許壽裳和魯迅完全取一致步調，互相支持，並肩戰鬥。女師大被段祺瑞政府非法解散時期，魯迅和許壽裳共同幫助學生在宗帽胡同租借新址繼續上課，他們並義務授課，一直堅持到女師大復校開課。1926年“三·一八慘案”以後，段祺瑞執政府，準備進一步迫害緝捕愛國進步人士，魯迅和許壽裳都被列入通緝的黑名單上，他們一起度過一段艱危的避難生活後，魯迅奔赴廈門，許壽裳也隨即離開北京，回故鄉避居了。魯迅一到廈門，就四方設法向廈門大學推薦許壽裳來校任教，只是因為沒有找到得力的人，所以一直沒有薦成，但魯迅一直把推薦許壽裳的事掛在心間，這在魯迅和許廣平的通訊裏，曾多次提到。後來魯迅準備離開廈門大學而赴廣州，接受中山大學之聘，魯迅自己尚未到中山大學之前，就四處寫信，推薦許壽裳到中山大學任教，後來在老友沈兼士、孫伏園等幫助下，中山大學接受了魯迅的推薦，聘許壽裳到中山大學任教，魯迅獲知中山大學同意聘請許壽裳來任教的訊息後，一連發了幾封信，催促許壽裳趕赴廣州。許壽裳一到廣州，正值魯迅剛從香港回來，又因足受傷，不便行走，就派許廣平迎接。當時魯迅住在中大大鐘樓上，魯迅就請許壽裳和他同住一室，各佔一角，故友再次相逢，忻喜之情不可言喻。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

記》中回憶這段重逢的彼此喜悅情景時說：

“那時候，他住在中山大學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間屋——通稱‘大鐘樓’，相見忻然。書桌和床鋪，我的和他的佔了屋內對角線的兩端。這晚上，他邀我到東堤去晚酌，肴饌很上等甘潔。次日又到另一處去小酌，我要付賬，他堅持不可，說先由他付過十次再說。從此，每日吃館子，看電影，星期日則遠足旅行，爲是者十餘日，豪興才稍疲。”

後來魯迅因不願和現代評論派合作共事，又憤慨於校方對“四·一五”被捕學生不予營救，怒而辭去中山大學教職，許壽裳和許廣平共進退，採取相應行動，同時向校方提出辭職。充分表現了他們患難與共，生死相托的深厚友誼。

1927年10月魯迅由廣州到上海，放棄教書，專門從事著述，依靠稿費維持生活。當時已在南京大學院任秘書長之職的許壽裳，爲使魯迅有一個安定的生活條件，就把魯迅處境向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作了匯報，向蔡元培推薦魯迅爲大學院特約撰述員，使魯迅每月有三百元的固定收入，讓魯迅無後顧之憂，安心寫作，致力於革命文學事業。

魯迅定居上海的十年，雖然許壽裳先在南京大學院任職，1934年又去北京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兩人南北分居多年，他們兩顆赤誠之心緊緊相通，隨時隨地都關心着對方的安危。1931年春，因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逮捕，上海、北京小報謠言四起，或說魯迅被捕，或說魯迅已死。這就急壞了南京的老友許壽裳，但正當許壽裳焦急萬分的時候，就很快接到魯迅的告安信，這封信的體裁和措詞與以前的信大不相同，不但加句讀，而且全用暗語，除老友許壽裳可以理解外，換別人則如讀天書，不知所云，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季載吾兄左右（：）